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历史影响

□ 王玉强

1939年7月，刘少奇在延安发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以下简称《修养》）演讲。这部名篇丰富了党的建设理论，80多年来教育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首次发表以来，《修养》一直是推动我们党自身建设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许许多多的共产党员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通过不断学习、修养、锻炼，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纯洁性，努力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1939年《修养》出版后，很快就在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国民党统治区和敌占区传播开来，并产生了广泛影响。1942年春，刘少奇应奥地利医生罗生特请求，写信介绍个人经历时说：“用我名字公开发表的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中流行较广的（发行约有十万册）一本小册子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高度重视《修养》的重要意义，多次要求全党同志认真学习。1942年4月20日，毛泽东在《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中，谈到必须加强党内教育时指出：“延安的干部教育好了，学习好了，现在可以对付黑暗，将来可以迎接光明，创造新世界，这个意义非常之大，这是全国性的。”他要求新华社“广播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教育材料，并把它同列宁论纪律、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等文件放在一起播出。1943年，毛泽东在同一位抗日根据地领导人谈话时说：“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写得很好，你读过没有？他讲‘修养’，我讲‘整风’，意思是一样的。”

《修养》在延安整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42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决定把《修养》作

为整风学习的22个文件之一。在整风学习中，刘少奇的《修养》和毛泽东等人的著作一起，成为党员干部提高理论水平，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总结历史经验，检查工作和思想，加强党性锻炼的有力思想武器，推动了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进步，也推动了全党的团结统一。

很多参加整风学习的党员干部，通过学习《修养》来反省自己、改造自己。当时参加整风学习的杨尚昆回忆说：“在延安整风中，这本书又被毛泽东选定为干部整风必读文件，人手一册。大家认真学习它，用来对照检查自己，从而哺育了整整一代的共产党人。”曾在延安学习过《修养》的黄树则也回忆说：“一想起少奇同志，就会想起我们曾经熟读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是一本深入共产党员之心的书。我们这一代，谁没有受过它的熏陶和教育啊！”著名爱国军人续范亭，在谈到这本书后，大加赞赏，自己出钱印了上万册，发给周围的人和部下，要他们学习，还通过黄河书店广为发行。很多战争年代的党员干部回忆，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牺牲战士的衣袋里装着的《修养》，已经被鲜血染红。

1949年，解放社出版了经刘少奇审定的《修养》修订第一版。到1951年10月，已经印了8次，发行29万册。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一次机关评议工资时，很多党员发生思想波动。对此，董必武说：“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说，共产党员不要和别人比名利地位，要比的是自己比别人多做多少工作。碰到评议工资这类问题时，大家可以把这本书再看一看。”

1962年8月1日，《红旗》杂志第15和16期合刊重新发表了经刘少奇修改审定的《修养》，《人民日报》也在当天用6个整版转载。

8月2日也就是《红旗》重新发表《修养》的第2天，毛泽东在同华北地区部分省区党委负责人谈话时说：“《红旗》发表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很及时。”它对当时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正视困难，正确处理困难中的各种问题，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据不完全统计，从1949年到1966年，《修养》共印行了2000多万册。《修养》为什么如此受欢迎？1962年在一次汇报会上，刘少奇说：“20多年人们还想着这篇文章，包括国外也有人认为这篇文章有可取之处。什么道理呢？我想，马恩列斯解决的是党建路线问题、理论问题，路线问题解决了以后，要提高党员的修养，要解决党员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的矛盾问题，这方面我们有新东西，有创造。”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很多模范人物如焦裕禄、雷锋等，无不受到了《修养》的影响。焦裕禄去世前对大女儿焦守凤说，你从我手里继承的只有党的事业，别的什么也没有。我留给你的，只有两本书，“你要好好读它，那里面会告诉你怎样工作，怎样做人，怎样生活”。焦裕禄去世后，人们在他病榻的枕下，发现了两本书：一部是《毛泽东选集》，一部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修养》不但在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在世界上产生了重要影响。这部经典著作有英文、法文、德文、俄文等多种译本，在许多国家发行。纳尔逊·曼德拉在自传中说，自己写了一份题为《如何做一个优秀的共产主义者》的文件，“这个文件的题目源自一位名叫刘少奇的中国理论家的著作”。曼德拉曾说，如果从个人修养来说，对他影响最大的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摘自2020年第1期《求是》，原标题为《重溫〈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绕过挺立190多年、浓荫蔽日的古龙眼树，一个庭院广场赫然出现在眼前。正南边，是当年教授理论的课堂；东西两侧，是由走廊改造的学员宿舍……

“1926年，毛泽东同志在这里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并担任所长。龙眼结果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就经常和学员们吃着这棵树上结出的果实，聚在偌大的树荫下谈心。”讲解员陈朋坤深情讲述。

这里是位于广东广州市越秀区中山四路42号的“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一路边听边看，脑海中重现当年的画面：

每天早上军号一响，学员们一身戎装，集合到广场步操；日间端坐课堂，认真聆听革命理论；军事训练也是重点，列队、射击样样不少……

为培养农运干部，在中国共产党倡议下，从1924年7月到1926年9月，广东革命政权在广州先后举办了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共产党人彭湃、罗绮园、阮啸仙、谭植棠、毛泽东相继主持下，农讲所共培养了700多名农运骨干。他们奔赴全国各地开办地方农讲所和农训班，点燃了农民运动的星星之火。

纪念馆馆长顾晖介绍，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农讲所招收了来自20个省份的327名学员，是办学时间最长、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一届。“毛泽东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程，其中《中国农民问题》授课总时长达到23个小时。”

主持第六届农讲所期间，毛泽东主编了《农民问题丛刊》，这也是纪念馆的一件镇馆之宝。在为《农民问题丛刊》写的序中，他鲜明地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

“我们离所时，毛所长叮咛大家要做革命的火种，让革命烈焰在塞外熊熊燃烧起来。”蒙古族学员高布泽博的回忆，道出了广州农讲所对中国革命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一届农讲所学员高恬波是广东第一位中共党员，是广东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之一；

第三届农讲所学员韦拔群，结业后回广西东兰继续从事农民运动，主办农

播撒革命的火种

□ 贺林平

讲所，培养骨干，发展农会 and 农民武装，把农运推向右江地区，后参与领导百色起义，建立右江苏区……

73岁的老党员陆兆波是广州农讲所纪念馆的资深游客，从年轻时就常到农讲所参观，“纪念是为了更好地前行，每次来都有新感悟。”

（摘自2021年1月20日《人民日报》）



用热血浇灌革命之花

□ 姜晓丹

“‘天已拂晓，进城无望，取营救亡将尽，现存十余人，但革命军人有进无退，如何处置，请指示。曹渊’。刚写完最后一字，曹渊就不幸头部中弹。‘渊’字最后一笔，拖了有三四寸长。”

广东肇庆，叶挺独立团团部旧址纪念馆，声情并茂的讲解，把参观者的思绪带回那个战火纷飞的岁月。

曹渊是叶挺独立团第一营营长，也是共产党员，牺牲时年仅24岁。那是1926年9月，叶挺独立团兵临武昌城下。经过一夜奋战，终因寡不敌众，登上城墙的第一营将士牺牲殆尽。这是叶挺独立团战斗精神的一个写照，虽过去已近百年，但依然令听者动容。

1925年，广东革命政府两次东征，讨伐军阀陈炯明。时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的陈延年与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周恩来等人决定建立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队伍。当年11月21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二师三十四团成立，共产党员叶挺担任团长。翌年1月，三十四团番号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

独立团设中共叶挺独立团支部，下辖6个党小组，归属中共广东区委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军队中设立的第一个基层党组织。排以上干部任免、人员补充以及重大政治军事活动等，都由独立团根据中共广东区委的

决定自行处理；团长叶挺则直接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叶挺以苏联红军的模式要求部队，并开展“反贪污、反打骂、反报复”的运动，将建团初期的军阀习气一扫而光。

1926年5月，叶挺独立团出师北伐，短短半年时间内转战湘、鄂、赣三省，行军数千里，屡建奇功。1927年1月，受民众委托，武汉汉阳兵工厂制作了一块高1米、宽0.5米的铁盾牌，正面镌刻两个大字“铁军”，赠送给第四军。叶挺奉命代表第四军接过了这块铁盾牌。

纪念馆里展示的照片上，“铁军”二字遒劲有力。盾牌背面，还有这样的字句：“烈士之血，主义之花。四军伟绩，威震遐邇。能守纪律，能毋怠惰；能爱百姓，能救国家。摧锋陷阵，如铁之坚；革命抱负，如铁之肩。功用若铁，人民倚焉；愿寿如铁，垂亿万年。”

“曹渊、许继慎、卢德铭……武昌城下、湘江河畔、琼州海峡，到处都埋有叶挺独立团英烈的忠骨。”讲解员语气沉重，念出一个个烈士的名字。

北伐战争结束后，叶挺独立团再负起更光荣的使命。1927年8月1日，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的叶挺独立团，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成为人民军队的重要来源之一。

（摘自2021年1月20日《人民日报》）

忆往事

人民的好粮食部部长
陈潭秋：

曹荣

陈潭秋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青年时代就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秋与董必武等人组建武汉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7月出席党的一大，矢志不渝地投身于党的革命事业。1933年初陈潭秋来到中央苏区，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并于1934年初担任中央苏区第一任粮食部部长。作为首任粮食部部长，陈潭秋为保障苏区的粮食安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被称为“人民的好粮食部部长”。

“要注意筹粮不能影响群众的生活,不能让群众挨饿”

1934年5月，正是苏区青黄不接的时期。为了保证苏区红军的供给，党中央和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决定再向群众借谷24万担。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粮食部的干部中出现了畏难情绪。陈潭秋冷静地拟出了三条措施：一是集中突击力量到战争最需要地区，要迅速完成，务必保证作战部队的给养；二是已经完成和快要完成的地区，要最大限度地发扬群众热情，争取超额完成；三是落后地区必须紧急动员，检查工作中的失误，组织突击力量。实行这种分类指导下，成功完成了借谷任务。

“对敌人要仇恨，对群众要爱护。”这是陈潭秋的口头禅。在征粮借谷工作中，陈潭秋改进了征粮办法，减轻了群众的生活负担。

当陈潭秋率领的中央粮食工作队来到福建长汀镇时，由于群众的革命热情，也是出于对陈潭秋的信任，这里很快集中了许多粮食。但是陈潭秋曾在长汀调查，了解到群众仍然很困难，就说“筹粮一定要注意从实际出发，要注意筹粮不能影响群众的生活，不能让群众挨饿”。最终，大家通过讨论，一致同意，向群众征购三分之一，借三分之一，退回三分之一，并向群众致谢。这一宣布，让长汀镇的群众欣喜不已，奔走相告：潭秋部长经过调查研究，了解群众的疾苦，关心群众的生活，真是我们